

韩天航 中篇小说选

回沪记

棚户纪事

背叛

养父

我的大爹

母亲和我们

牧歌

韩天航

著

韩天航经典文学作品选集

军垦文化圣地·戈壁母亲故乡系列文学图书



韩天航中篇小说选

韩天航 著

赠泰州师范大学图书馆

韩天航

2019. 6. 10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天航中篇小说选 / 韩天航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7.7
(军垦文化圣地·戈壁母亲故乡系列文学图书·韩天航经典文学作品选集)
ISBN 978-7-5143-6266-4

I. ①韩… II. ①韩…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39497号

韩天航中篇小说选

作 者 韩天航
责任编辑 申 晶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三河市国新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 mm 1/16
印 张 22
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6266-4
定 价 120.00元 (全5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目 录

回沪记	1
棚户纪事	39
背 叛	82
养 父	128
我的大爹	174
母亲和我们	221
牧 歌	271
奎屯纪行	鹿俭克 338
后 记	韩天航 345

回沪记

出租车只好停在后门，因为前门不开，前门是属于余家外婆的，不让人随便进出的。我至今仍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叫她余家外婆。其实她还没有做外婆。她丈夫早死了，只留下个三十好几还没出嫁平时又很少回家的女儿。但大家还是叫她余家外婆，似乎是只要有女儿就不怕做不成外婆似的。余家外婆深居简出，不许任何人进她的房间，也很少同别人搭讪，再说前门是她家的正房，也不便让人当过道。只有后门是属于大家的。从后门进去是灶间。一幢楼六家人家全挤在里面做饭。所有的人要进自家的房间都得从后门进，其中包括余家外婆。这样前门就失去了门的功能。余家外婆索性在门前安上了一个装饰玻璃柜，房间也就多出了好些实用面积。

我把行李从出租车的后备厢搬出来，大大小小地堆了一堆。此时大家正在做晚饭，鸡鸭鱼肉同各种蔬菜的气味糅在一起从后门喷出来，很是诱人。我一下车就有人喊：“小搨姆妈，小搨爷叔回来了！”但阿嫂对我的到来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热情。等我把行李全搬下车后，她才围着花围兜握着锅铲出来，出租车已喷着烟开走了。化了淡妆戴着金项链、金耳环、金戒指的嫂子还是这么年轻漂亮，而且显得越发洋气。她看着出租车消失在弄堂口后，很不满地说：“怎么？你坐出租啊？”好像我不配坐出租似的。我只好解释说：“行李太多，又没人接。”她又忿忿然地说：“不是叫你阿哥去接你吗？”我又为阿哥辩解说：“大概厂里太忙，脱不开身。”她又找茬说：“出租敲你榔头了？收你几钱？”我说十七元。她就把锅铲往下一甩斩钉截铁地说：“敲了！”

二楼是我们家的。有三间房，一大一中一小。一中一小的面积加起来也没有那间大的大。母亲在世时，一中一小已经给了阿哥。阿哥夫妻俩住中的，小间小插住着。在上海有这样的住房条件已相当不错了。当年漂亮但家境不好的阿嫂主要是奔着这住房才同阿哥结婚的，母亲说：“等我死后，这大间就留给阿堃。”阿哥只比我大一岁，我们同时上的学，初中毕业就面临着上山下乡。根据那时的政策，反正我们兄弟俩中得有一个下。母亲说：“阿堃去吧，你阿哥是长子。”我不得不背着行李去了江西，从此没有回过一次家。我恨母亲，为什么偏偏让我忍受下乡之苦，那时，一想起母亲在做这一决定时的冷静与坚定，我就无法原谅她。我有几个同学支边去了新疆，几年后我也去了，因为那儿的农场能吃饱肚子，每月还有三十几元的工钱。在江西插队时，累死累活一个工分才挣七分钱。去新疆后我很快当上了小学教员。一晃就是二十年，但我却从没给家里去过一封信。还是我的一个同学回沪探亲时，把我的情况和地址告诉了我母亲。我那历来十分坚强的母亲哭了，说：“阿堃勿认我这个姆妈了。”

母亲是富户人家的小姐，却偏偏看上了我那个当工人的父亲。从过去留存的几张旧照片中可以看出，父亲长得很英俊，但却是一副老实巴交的憨相。开着几间厂子的外祖父自然是这场婚姻的坚决反对者，自己的女儿要与他厂里的一小工人结婚，这太丢他的脸面了。但是铁了心的母亲硬是同父亲结了婚。也没有想到，这却给我母亲带来了一生的平安。父亲在我两岁那年，在一次护厂斗争中牺牲了，他那“烈士”的称号庇护着我们，使母亲在历次运动中都免受了冲击。唯一的遗憾是父亲的“烈士”牌位没有保护我躲过上山下乡这一关，反而成了居委会动员我下去的一条非常具有说服力的理由。母亲也痛快地表示，烈士子女应该带头。那时并不知道抱着韬晦之计的母亲对我下去一直是深感内疚的，并且这内疚变得越来越沉重。后来当年插队去江西的人基本上都返城后，母亲那颗十分坚强的心竟再也承担不住她那沉重的内疚了。她在给我的信中说，望儿，你再不来看我，我就去看你。如果你能理智地考虑一下，你的苦难不该全由你母亲来承担。接到那信我哭了一夜，觉得自己把一切仇恨都集中在母亲身上是太不公平了。火车到上海时已是午夜，就在月台上，我那白发苍苍的母亲抱着我这个有了不少白发的儿子在众目睽睽之下，竟毫无顾忌地号啕大哭起来，我也用一串串滚落的泪化解了我对母亲那种不该有的恨意。

我一直以为我们家很穷，母亲没有工作，是靠父亲单位给的那点儿抚恤金把

我们带大的。我们总是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唯一感到富有的是我们那几间房子。那是外祖母花了几根条子买下来偷偷给我母亲的。烈士父亲也同样保护着这几间房子。在我第一次回来的那个晚上，母亲悄悄地同我聊到天明。那时我才知道母亲竟是这么富有！母亲在她的一只镶着金边的小铁盒里藏着一笔很大的财产，她让我看了那么多耀眼的东西，还告诉我，她在国外还有一笔财产，但她又很严肃地警告我说，这事绝对不能告诉你阿哥阿嫂，一向冷静的母亲这时毫不掩饰她的愤怒说，他们俩都不是个东西，我要把你从新疆弄回来，我要把这一切都给你。

可是在饭桌上，阿嫂却极力反对我回上海，说上海又勿是天堂，新疆也勿是地狱，人走啊走了，再回来凑啥热闹。母亲说，我就要叫阿堃回来轧闹猛，因为现在我太孤单。阿嫂不愿意了，把筷子往桌上一拍，气咻咻地回到自己房里。阿哥为难地一摊手说：“作啥？作啥？你们咯是作啥？”我也把筷子往桌上一拍说：“姆妈，我一定回来！”

我把行李一件件搬进已属于我的那间大房子里，对着母亲的遗像鞠了三个躬，鼻子一酸，竟哭了。觉得自己很对不起母亲，母亲用她那二十几年积累起来的内疚补偿了我那些所年所遭受的苦难。她又把那一笔财产和这间几十平方米的房子留给我。那笔财产就深藏在一个角落的隔墙里，母亲没有讲过这笔财产的来历。我想，也许是母亲当富家小姐时的积蓄，也许是外祖母偷偷给她的，但也不能排除外祖父原谅她后的馈赠。我还记得“文革”刚开始时的一个深夜，外祖父曾偷偷地来找过母亲，但以后不久他就死在“牛棚”里，那些东西会不会是那晚送来的？这一切都随着母亲的去世而成了个谜。

据阿哥讲，母亲感到自己快不行时，就催逼他尽快办我调回来的手续，但由于阿嫂的从中作梗，这事一直没有大进展。有一天晚上，母亲拿出两根金灿灿的条子放在桌上，说：“这是你外祖母在我同你们阿爸结婚时塞给我的，我一直保存到现在。阿堃调回来的事你们办成了，有你们一份，要是办不成，我统统给阿堃，这三间房子的产权也给阿堃，你们每月就给阿堃付房租！明天我就去找律师来写遗嘱。”母亲这话说得很坚决，阿嫂的脸吓黄了，说：“都是阿森呀！我催他赶快把阿弟的事办好，他就是拖！”

当我调回的手续都办好后，母亲没有食言，把一根条子给了他们，那一中一小的房产权也转给了他们。在请公证所的人来办转划手续时，阿嫂说：“姆妈，是勿是把那间中的留给阿堃，他只有一个人，一间中的就足够了。”母亲说：“他就

不再结婚了？他就不把孩子领回来了？你要叫他做一辈子的鳏夫？你的心也太狠了。”她对两个公证员说，“现在勿办了！要办，我就统统办给阿堃。”又一次吓黄脸的阿嫂说：“姆妈，你看你，我只是同你商量商量吗，不肯就算子，值得生那么大的气吗？”

母亲临终前我及时地赶回来了，她握着我的手宽慰地一笑说：“阿堃，好了，都好了……”她感到作为一个母亲，已经尽到了应尽的责任，对我们兄弟两个她也摆平了，于是她安心地去了。那时我才感到要当好一个母亲有多么的难啊。我再次朝母亲的遗像鞠躬，又泪流满面了。其实母亲并没有欠我什么，而是我欠母亲的太多太多……

我们这幢三层楼的房子住着六户人家。一楼是余家外婆的，二楼是我们家，以前三楼也住一户人家，但那家人搬走后，住进了四户人家。三楼也是三间房，大间住着刘老师一家五口，刘老师以前当过小学教员，“文革”时因一点历史问题把他弄到居委会去当杂务工。但对他的问题并没作结论，“文革”后，他到处找着要求落实政策，可人家说并没有对你的问题作过什么结论呀，落实什么政策？你的工作调动纯属正常的工作调动。弄得他哭笑不得，只好继续当他的杂务工。在居委会别人都叫他刘师傅，但在这幢楼里大家还是叫他刘老师，他感到很满意。中间住着林家姆妈一家三口，男人在厂里跑供销，一年里在家住不上几天，林家姆妈是个纺织女工，十几岁进厂跑了几十年的车，两条静脉曲张的小腿里仿佛弓着一堆又粗又青的蚯蚓。夏天她穿着短裤，我都不敢朝她的腿肚看。她心直口快，没有什么文化，头脑又有些简单，喜欢凑热闹。小间住着一对小夫妻，女的生孩子后，把孩子留在婆家。他俩好像很忙。也勿同别人搭讪，又很少在家做饭吃，有时晚上做顿饭也是女的匆匆做好，端上去后就再也不下来了。大家至今不知这对男女姓啥叫啥。背后说到他们时就叫“这个男的”“这个女的”。而连生家则住在阳台边上架起来的一个小阁楼里，一张铺挤在叠压着的家具里面。天热时，弄出一张折叠式小桌在弄堂里吃饭，天冷时就把折叠桌搁在床上吃。那张铺就是他们一家三口吃饭、睡觉、活动的场所。但他们一家却活得挺滋润。我那天坐在门口帮阿嫂剥毛豆，连生也在门口收拾几条手指头长的小鲫鱼，他问我，小擂爷叔，你在江西插了几年队啊？我说三年。他一摇头说，喔哟作孽。在新疆呢？我说有十几年。他又一晃脑袋说喔哟作孽，结婚了吗？我说结过婚但离了。他瞪大眼睛说离婚？哪能会离婚？我说女人有了另外的相好。他连摇两下脑袋说喔哟作孽作

孽，有小人？我说有个女儿判给女方了。这次他没有说作孽，把鱼弄好后，放在一个碟子里，撒上佐料准备清蒸。然后回过头来说：“阿堃哥，你的命真苦。”我不知道他是在同情我还是要以我的命苦来衬托他的滋润和满足。

刚回来的第一顿饭是和阿哥阿嫂一起吃的，其实我很想在外面吃一点。但双方都要顾及面子，可饭桌上勉强拼凑出来的热情却更使人感到难堪和不快。阿嫂总想弄出点因由来挖苦我，甚至连我那岁月艰难而铸成的老相也成了她讽刺我的话题。她剥开一只黄很多的梭子蟹放在我跟前说：“阿堃，吃呀，这梭子蟹是我特地为你买的，快吃呀。”在买小菜上，阿嫂的精明是没说的，总是又便宜又好。但她又说：“阿堃，你看看你，比你阿哥看上去起码要老十岁。”那蔑视的口气就像竹针在刺人的心。我忍不住反唇相讥说：“有啥稀奇的，当初要是阿哥下乡，他现在起码要比我老20岁！”阿哥就喊了：“做啥？做啥？你们这是做啥！”

那顿饭吃得全然没味。而以后在阿哥家搭饭吃也已成为不可能，可外面的饭菜既没味道又贵。于是花了些钱，打通了该打通的关节，在阿哥与余家外婆的灶位中间也挤进了我的煤气灶，大家都很不高兴，因为拥挤的灶间显得更拥挤了，他们的利益受到我的侵占，那抱怨的眼光都仿佛在说：“你回来做啥？出呐。”我感到在上海同样生存得很艰难。当初母亲要我回来时我曾犹豫过，因为对在哪儿生活我已有些麻木了，可是为了补偿母亲那颗快被沉重的内疚压碎了的心，我才决心回来的。现在他们的这种眼光使我感到恼火，正像阿嫂毫不讳言地反对我回来使我感到恼火一样。可我偏要同你们挤在一起活着，我也要维护我在这儿的生存权。

但一切都是陌生的和敌视的，包括自己的阿哥和阿嫂。开始几天阿哥还略微关照我一点。来后的第二天他对我说：“阿堃，上楼时把我们家的过道灯拉一下，上来再关掉。”我这才发觉，楼梯的过道上吊着六只灯泡，像拥在一起的一嘟噜玻璃葫芦。那天傍晚天色阴沉，大家又挤在灶间做饭，六只过道灯都齐刷刷地亮着，我感到不可思议，一只灯就可以了，干吗要这么浪费呢？我下楼时自以为理由充足地关掉了其他所有的灯，只留下我们家的那盏。我想就是阿嫂责怪起来，这电灯费由我来掏好了。一个月就那么几元钱的事，大家住在一起，何必这么斤斤计较呢？我正准备洗菜，连生第一个叫起来：“出呐！啥人把我的灯关掉啦？”接着林家姆妈、刘老师、余家外婆，还有“咯个女人”也参进来一起喊：“啥人啊，关阿拉灯作啥？神经出毛病啦！”

我告诉他们是我关的，并解释说开这么多灯实在太浪费，用一盏灯就行了，这盏灯的电费由我来掏。这一说不打紧，他们反而闹得更凶，连生冷笑着说：“喔哟！你倒大方呀，是欺阿拉没有钞票咋的？是想在阿拉面前摆阔咋的？”林家姆妈也凑上来说：“一个新疆户头呀，又勿是从美国香港回来咯罗，有啥阔好摆的！”刘老师也在边上慢条斯理地说：“阿埜，我晓得你这是好心，但你这种做法勿对，这样做是看勿起阿拉，以为阿拉穷。这点电费阿拉还付勿起？”连生又接上说：“阿埜哥，我勿是看勿起你，你要真想摆阔可以呀，上国际饭店或者南海渔港去摆两桌，甩上两千三千请请大家。一只电灯几度电请，阿拉勿领！”余家外婆也攒上来一句说：“一个新疆户头竟要拿这点钞票来压阿拉上海人，真有点拎勿清！”

连生喊：“开灯！”

一瞬间所有的灯又明晃晃地耀起来，把楼道照得通明，它们就像六只恶狠狠的眼睛在压我这个新疆户头。这时我听到阿嫂也冷冰冰地甩出三个字：“阿木铃！”

第二天我打电话请供电公司的人到我房里安了一只水电表，同时在楼道上也加了一盏灯。本来六盏灯是六六大顺，现在七盏灯成了七巧七巧（蹊跷蹊跷）了。后来我上楼下楼，也都习惯地拉亮自己的那盏灯，对别人的灯是否亮着竟也感觉不到了。

余家外婆的女儿叫余婕，在市郊一家工厂做工。他们厂礼拜是星期四，所以每个星期三的傍晚就回家，住上一夜，第二天吃罢中午饭回厂。她每次回来都要从乡下带点菜来，说是乡下的菜新鲜，有时还有活鸡活鱼或活虾，倒在盆里噼噼啪啪乱蹦乱跳，然后做上一桌丰盛的菜肴来孝敬她母亲。她小巧、漂亮、机敏。虽已三十好几了，但看上去最多只有二十来岁。她至今还没有结婚，甚至连对象也没找，活得自然也很寂寞。她挨在我边上做饭却从来不同我说一句话，也不同周围的人搭腔，性格似乎也很怪僻。连生说她是假清高。我想老姑娘大都性格有些怪异，她恐怕也是。

那几天阴雨连绵，整个空气湿漉漉的像能挤出水来。那天她回来面盆里又蹦跳着鱼和虾。我在炉子上炖着一只鸡，当鸡快要熟了才发现瓶里的酱油没了。白斩鸡不蘸酱油怎么吃？于是我撑着伞提着瓶子去打酱油。想不到阴绵绵的雨天，杂货店里买酱油醋和啤酒的人竟还会那么多，而营业员十分漫不经心，有人催一句他就说：“慌啥，慌啥，钞票点错啥人赔啊？”等了半个多小时我才把酱油打上，心想说不定炖在炉子上的鸡汤都熬干了。我匆匆赶回家去，发现锅里的鸡不翼而

飞了，挤在灶间的人都闷声不响地绷着脸。我只好问阿嫂：“我的鸡呢？”正在煎鱼的阿嫂板着脸说：“你的鸡没了，我哪能晓得？”

我走到门口，发现门口倒垃圾的桶里散落着一小堆鸡骨头，还在冒着热气。我愣了半天，这时余婕做完饭菜往屋里端时，嘴缝里挤出一句：“欺侮弱者算啥本事，真倒胃口！”而连生在灶前低着头轻声地还了她一句：“管你鸟事！”

我感到一股热辣辣的火气直冲脑门，我端起油汪汪的鸡汤泼向门口，然后撑着伞来到马路上，感到一种抑制不住的愤懑，站在路边的一棵梧桐树下连抽了几支烟。我承受不住别人对我的这种戏弄。我在头上转到夜深才回家，既不想吃，也不想睡，只是一个劲地抽烟，没有想到的是深更半夜竟会有人来敲我的门，更使我吃惊的是敲门的竟是余婕。她很有礼貌地问我：“能进来吗？”我请她进来后，她忿忿地对我说：“我实在憋不住了，我一定要同你讲。”她告诉我，我出去打酱油后，阿嫂就用筷子捣了捣我炖的鸡，她撕下一块尝了一下说鸡倒蛮嫩。说着就把鸡撩出来对大家喊，来！我请客，大家吃。连生也跟着喊，小搠娘请客，勿吃白勿吃！他们几个上去三下五除二，就把鸡瓜分了。连刘老师都吃了。这是种凌弱心态，欺侮弱者，欺侮外来户。

她走时我很感激地向她道了谢。

又一个星期三的傍晚，我特地又去买了只鸡炖在锅里，余婕又在我边上做饭。我假装出去买东西，用一根铁链条把锅盖锁起来。余婕好像明白了我的意思，有意问：“阿堃哥，你这是作啥？”我咬牙切齿地说：“防贼骨头！”

后来我同余婕就有了更多的交谈，有时还谈得很投机。连生阿嫂他们就窃窃私语起来。

我感到自己虽处在人海中却如同处在沙海中一样孤单，渐渐地我就盼着星期三的到来，只有余婕回来能同她说上几句话。这里的人都说她清高、怪僻，但我却觉得她挺可亲。对她的身世我不太了解，虽然余家外婆同我们家一样，早就住在这儿了，但我们没有任何往来。我上山下乡时，她已有十二三岁了，是个很漂亮的小姑娘。后来听说她也插过队，不过调上来早，那时调上来也只能调到郊区，她好像感到很满足，一直在郊区那家工厂做生活，没有再往市里调。又是一个星期三，天气已变得很炎热，我渴望能见到她。但奇怪的是那天她竟没有回来。下一个星期三我以为她一定会回来，但还是没有回，余家外婆也没什么反应。我好生奇怪，可又不便打听。像我这样一个离了婚的男人去打听一个老姑娘干啥？况

且我与她又没有任何关系。

第三个星期三她倒是回来了，是到我们吃好饭才回来的。我听到她往盆里倒鱼虾的声音，就下来看她，但她根本不看我，继续低头洗她的鱼，于是我便讪讪地出门，装出我下楼不是为了看她而是为了出门似的。后来她才告诉我，我们之间在灶前交谈了几次，别人就捅到余家外婆那儿，余家外婆就对她说：“勿要同阿堃搭讪，当心人家说闲话。”所以她是有意两个星期不回来。她说：“闲话传起来太伤人，尤其像我俩现在这种状况。我倒不是怕，而是根本没有的事让人指指点点说三道四，成为他们寻开心的由头，我感到恶心！”

母亲是个含而不露的人，其实她受过良好的教育。也许是她过于的浪漫，或者具有一种叛逆的精神才找我父亲的。母亲在婚姻上作了一次错误的选择，要不外公不会那么极力地反对。但从后来的三十多年的情况看，母亲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她背叛了资产阶级家庭与工人阶级结合，使她获得了三十多年的平安。并像一个工人的家庭妇女一样笨笨拙拙地生活了几十年，她终于等到了黎明的那点儿曙光。在我守在她病榻旁的那些日子里，她同我讲了许多，我才感到母亲的谙于世事与惊人的忍耐力。母亲说到阿森的俗气与毫无出息，说到阿嫂那浅薄的精明和露骨的自私。母亲惋惜地叹说，现在是可以干一番大事业了，但他们不是能干大事的人。母亲临死前的那个晚上显得特别清醒，她又告诉我，外公在上海快要解放时让我四舅带着一部分资产转到了香港，后来又转到美国。这件事是外公在自杀前告诉母亲的，说到那份产业中也有我母亲的一份，而外公的那一份也转给了我母亲，算是与我母亲和解的一种表示。他把这份遗嘱交给我母亲后就自杀了。母亲捏着我的手带着无限的希望说：“我已写信给你四舅了，以后他会同你联系的，但这事千万别同阿森他们讲，他们会坏你事情的。阿堃，姆妈希望你能成为像你外公一样的人。”对外公我已没有什么印象了，只知道他以前是个很有钱的资本家。母亲也想让我当资本家吗？不过那年月资本家是个十分可怕的称谓。而现在却是个让人敬慕的名称了，只不过叫法改了一下，叫企业家。

母亲对我的亲近引起了阿哥和阿嫂的猜忌与不满。当母亲拿出两根条子时，他们才恍然想到母亲曾是富家小姐，可能藏有私房钱。他们想重新讨好母亲，显然为时已晚。母亲去世后，阿嫂拿出母亲给他们的那根条子，打成戒指、项链、耳环来装饰自己。但阿哥阿嫂都认为，母亲留给我的除那间大房子和那根条子外，肯定还有其他东西。可又没有什么证据，况且母亲的遗嘱也写得明白，除给他们

的房子条子外，其余的东西都归我所有。阿哥很不满地刺我一句：“姆妈还是喜欢你。”我也回了他一句：“姆妈要是喜欢我，就不会把我赶到乡下去！”

母亲死后的那些日子我一直盼着四舅的回信，但四舅那边却久久没有音信，日子一长，我甚至怀疑有没有四舅这个人？是不是母亲在病重期间的一种幻觉？

孤单是一种痛苦，但让别人冷嘲热讽更是一种痛苦。他们看不起我仅仅因为我是个新疆户头，我从来认为在去新疆这件事上我自身并没有错，但他们却认为在那儿充军二十年本身就是错。正像林家姆妈讲的那样“又勿是从香港美国回来的罗”。好像只要从香港或美国回来的就一定光彩一样。他们更看不起我的是我的工作，码头上的勤杂工。“工钿只有一眼眼。”经济基础低，社会地位自然低。能有资格看不起别人本身就能让自己感到一种满足。余家外婆不许余婕同我接触，一家挤在只有几平方米的阁楼里的连生对我说什么都嗤之以鼻。那次中国足球队输给卡塔尔队，我说：“中国队的后卫线漏洞太多。”“阿埒哥。”他倒是每次都这样称呼我，“啥叫后卫线你懂哦？你看过几场足球赛呀？告诉你听，勿是中国队的后卫线有啥漏洞，是中国队的脚头不行，踢勿进人家的球门，只好被别人家踢进去。”后来又轻声地咕噜一句，“新疆户头懂个啥！”

我恨不得把烧热的油朝他头上泼过去。

我觉得我活得不是很累而是很压抑。硬要在这样的环境下挤着生存，非得有坚强的意志不可。而恰在我感到这种孤单、寂寞与压抑的时候，我的前妻却来了信，信很简单，说都是因为燕燕弄得他们夫妻不和。“你把燕燕接走吧，你要不来接，发生什么意外我不管！”在她同现在这个丈夫准备结婚时我就向她提出把燕燕还给我。可她说：“你想得倒美，不行！”而现在她拖着燕燕感到累赘了，又急于想摆脱她。当初我们还没有离婚时她就同现在这个男人私通，无法理解，那个男人在各方面都不如我，她同他私通到底图个啥？这事被我发觉后我就提出离婚。她说：“离婚可以，但女儿得归我，我活着不能没有燕燕！”好像她虽然对丈夫不忠，但对女儿却忠贞不渝。我说：“好吧，就这样。什么时候你觉得女儿是你的累赘时，你就把女儿还给我。”她就歇斯底里地喊：“屁话！不可能有这种时候！”现在她却要把女儿扔给我了，甚至还带着威胁。但我觉得这是个好消息，女儿要回到我的身边来了！其实我时时刻刻都在想念着我的女儿。我接到信后就立即发出一份电报，表示马上去接。第二天我正准备写报告向单位请假，却有一份电报飞到我手里，说是燕燕已托一个出差来沪的同事带来了：×日54次，五号车厢。如

此迫不及待，但我却激动得要哭了。大后天就到！

那是个多雨的季节，出租车的车轮溅起路面上黑乎乎的泥浆，雨刷将细密的雨丝拨向两边。小播听说阿妹要来，偷偷地跟我一起去车站。已是高中生的小播倒对我很好，也同情我过去的遭遇。小播学习很用功，有时晚上做完作业就到我房里来同我聊天。我同他讲“文革”中的遭遇，他很困惑，不相信人世间会有这种事。他对这幢楼的人歧视排挤我也表示不满，他说你本来就是上海人，为啥勿能回上海来！在车上他对我说：“爷叔，姆妈跟阿爸讲，阿婆留给你好多钱，阿婆家过去是大资本家，肯定有好多私房钱。”我说：“小播，你信吗？”小播说：“我不信阿婆有钞票。阿婆一直过得很苦，舍不得吃用，早上吃咸菜泡饭，连根油条也不肯买。要是钞票，何必苦成这样呢？”我感到很心酸，自阿哥结婚后母亲就同他们分开过了。小播说：“阿爸姆妈从来不给阿婆一分钱，姆妈讲，阿婆的抚恤金够她花了。现在啥都涨价，阿婆那一点抚恤金真勿够用。所以阿婆总是吃得很省。”

54次车误点了。这趟车老是误点。就是这趟车，几十年来牵动着上海——新疆两头多少人的心！真不知要牵挂到哪年哪月啊！

误点的火车终于进站了。我的心狂跳起来。那沾满尘土的绿色列车像一条疲惫不堪的铁龙卧在了月台上。我朝五号车厢奔去，小播也紧紧地跟着我。那是节硬卧车厢，我朝每个窗口跳着喊：“燕燕！燕燕！”从头到尾整节车厢都没有看到燕燕的影子。怎么？她没来？我的心紧缩了。我眼光朝四下扫射着，人陆陆续续地快走完了。

“燕燕！”我大声地喊。

这时我看到有一个中年人同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朝我走来。那姑娘问我：“叔叔，你是燕燕的爸爸吗？”我说：“是呀，燕燕呢？”那姑娘看看中年人，中年人的脸沮丧得变了形。我的心顿时往下一沉，抓住他说：“我的燕燕呢？”

“在路上丢了……”中年人说，“过了西安，燕燕就不见了。”

“那你为什么不去找？”

“我赶的是紧急会议，不能耽搁。况且……”

我当即变傻了。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的家，仿佛在一瞬间做了个噩梦，等噩梦过后，一切都会好的，燕燕就会出现在我眼前的。但事实上是燕燕真的丢了。等我清醒过来并且能干哭上几声后，大概整幢房子的人都已经知道燕燕丢掉的消

息。阿哥阿嫂来劝我，让我请上几天假去找一找。刘老师对我说：“阿堃，不幸，真是不幸啊。”而连生在灶片间正喊着啜啜作孽。他在同情我的同时却在庆幸自己的幸运，因为他儿子正好地背着书包去上学。

我捂着脸号啕大哭起来，那长期积压着的愤懑这时也像决堤的江水一样宣泄了出来。

暴风雨过后是一种沉甸甸的平静。

那个中年人再也没有来同我见面，他可能害怕见到我，他在逃避责任，把我女儿弄丢了，竟连个面都不照！人们正在丧失着自己的责任心！我十分痛恨我的前妻，都是这个臭女人，竟随随便便地把女儿托付给这么个人！我恨不得飞回新疆去拧掉她的脑袋。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人有时就会处在这样一种束手无策走投无路的境地。

第二天的早上有一个姑娘出现在我眼前，我觉得似乎在哪儿见过，但一时又想不起来。她说：“叔叔，我陪你去找燕燕吧。”我这才想起昨天在车站上见过这姑娘。我晕过去后，她一直陪我到家里。她告诉我说，燕燕是从西安到徐州的那段路上丢的。车从西安开出后，燕燕去上厕所，结果就没再见她回来。她说，开始我们还以为她解好手后，在车厢里同别的小朋友玩呢。可时间一长我们就急了，到处找，都没找到。后来乘警也帮着我，一节节车厢找，也没找到，才知道肯定叫人拐跑了。我要是一直陪着她，就不会出事了。那姑娘说着就哭了。

我们决定到从西安至徐州的那段路上去找。54次车从西安到徐州共停几个站，姑娘都记下来。每到一个站我们都下去，上车站、上公安局去打听，我还印了许多张燕燕的照片，打听完后就把照片和地址留下，希望当地公安机关帮着继续打听消息。我知道这样找是大海捞针，但总可以抱一丝希望。

女儿的失踪使我每时每刻都感到自己那苦难的人生，脑子里时常闪现的都是一件件不幸的往事。妻子与我结婚后感情就不好，那时唯一同我贴心的是我的女儿，虽然她还只有三四岁。同妻子的感情破裂后，我不太愿意走进那个家，每天在办公室批改作业到深夜，晚饭也在学校吃，虽然家离学校只有几步路，有时吃完晚饭后有一个小脑袋就从办公室的门口探进来，喊一声爸爸。我批改作业她就陪着我，坐在我边上拿支铅笔在一张纸上画来画去，从不打扰我，等我批改完作业，然后我们一起回家。有一次她把一只白白嫩嫩的东西塞到我嘴里说：“爸，你吃。鸡蛋，妈妈给我煮的，我留给爸爸吃。”我搂着她哭起来，生活太不公平，干

吗要让孩子生活在两个已经没有感情的夫妻间呢？那时我就企盼着，总有一天我要好好补偿女儿的。可是当我迎来了补偿的机会时，女儿却失踪了。

我们从徐州一站一站地下车找到西安，又从西安一站一站地下车找回徐州，但丝毫没有结果。人们的态度十分冷漠，有的竟恶劣得让人心寒，令我感动的倒是那姑娘，陪着我辛苦劳累了一路。她叫沈雪莲，是新疆上海知青的女儿，去年根据政策在上海落了户。据她说，在落户时她舅舅极力反对，是她外婆出面坚持才把户口落下，家里只有一间房，搭了个小阁楼。她和外婆挤在阁楼里住，但不幸的是她外婆不久就去世了，她舅舅和舅妈就天天给她脸色看，甚至扬言要把她赶出门。她在新疆的母亲为了让女儿少受气，只好多寄钱回来。由于有利可图，她舅舅舅妈没再说赶她走的话，但对她一直都冷冰冰的，而且把大多数家务都压在她身上。可没想到一个月前她母亲得了重病，她赶回新疆时母亲只剩下一口气了。母亲捏着她的手说：“二十几年前，妈妈远离父母支边来了新疆，历尽了苦难，现在你又是远离父母，只身在上海落了户，妈妈这颗心怎么放得下呢？……”虽说心放不下，但人却还是去了，埋在四周都是荒凉的戈壁中的一块坟地里。说到这里，雪莲捂着脸泣不成声了。

外婆死了，母亲也走了，她说她回上海后，那间小阁楼不知道还能让她住多久。

“在新疆还有谁？”

“……爸爸……但他不是我的亲爸爸……”

她不肯再说什么，我也不便再问。这是个讨人喜欢的姑娘，瓜子脸，大眼睛，既漂亮又懂事，而且很能吃苦。我们再度失望地爬上火车时，我说：“雪莲，苦了你了。我们不可能这样永远找下去，我要工作，你要上学，暑假眼看也要过去了。”她哭了。我说：“别哭，你能这样帮我，我已经很感激了，你是个好孩子。回上海后，你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

溽暑难忍。厚厚的云层压得天空看不到一颗星星。厨房里照样热闹。我又听到盆里蹦跳着的活鱼声，才知道今天又是星期三了，余婕回来了。我很想下去见她，但躺在床上没动。我回来已有好几天了。别人对我的同情和惋惜瞬间就过去了，阿哥和阿嫂在同情中竟还透出某种轻松。溽热与心烦使我辗转无眠。半夜里有人敲门，那谨慎的敲门声轻得几乎听不见。我犹豫了一会儿后，还是去开了门：竟是余婕！她一闪身就进来了。

“很不幸，是吗？”她坐下来问。我无言以对。她说：“你瘦多了，脸色也很难看。”我告诉她，我现在有一种活不下去的感觉。她说，难道你女儿再次出现的希望一点都没有了？我说当然有希望。她说人有时候就为着一点希望才活着的，而且活着才有希望！她的眼睛湿润着，仿佛沉浸在自己的往事中，我沉默着。

那晚，她显得忧伤而美丽。她坦诚地告诉了我自己的不幸。插队时。她被几个农民在一个瓢泼的大雨天里轮奸了，她沾着一身泥浆，下身淌着血，跑到大队部向大队支书报告，大队支书又趁机奸污了她。“这对许多姑娘来说，就是可以去死的理由，但我没有去死。为什么要为别人的罪恶，来惩罚自己？我倒赞成这样一种宗教观点：生命是上帝给的，只有上帝才有权把它取走，别人弄死我有罪，自己弄死自己也有罪。我虽然落了一身的病，但我还在希望中活着”。她站起来说，“我们活着，就说明这世界还需要我们。况且你女儿只是失踪，还有找回来的希望。你总觉得自己命苦，可还有多少不如你的人，不要自怨自艾。”说完，她捏了捏我的手，走了。那手凉凉的，却很柔软，这种感觉一直伴我到天明。

痛苦正随着时间淡化，生活依然还是老样子。我想余婕说得对，我得好好活下去。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天不亮我就去菜场买菜。在上海要想买上点好小菜那就得起早。想不到菜场已经那么拥挤，前胸后背都贴着别人的肉，那么多人都在为能买到点好吃的东西而赶早受罪，人们好像只是为吃而活着。这时有人拉了我一把，我回头一看竟是雪莲。我问她怎么这么早出来买菜？她说她天天都是这时候出来买菜的。她问我燕燕有消息吗？我摇摇头说没有。我问她最近怎么样？她眼里便涌出了泪。她两腮下陷，眼圈发青，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她抹着眼泪说，叔叔，我可能上不成学了。我问怎么啦？她说那边的爸爸不是亲爸爸，他不再给我寄生活费了。舅舅让我辍学去打工。说养不起我。我知道她已上高二，辍学太可惜了。我思索了一会，拉着她的手很认真地对她说：“雪莲，要是你舅舅真不让你上学了，你就来找我。”她迟疑地看着我，我马上又说。“别忘了，咱俩都是新疆户头啊。”她咬着嘴唇朝我点点头，哭了。我也感到鼻子发酸。

母亲把那盒财宝交给我时，一再关照我不到万不得已时千万不要动用它。母亲自己就是这样做的。遵照她的嘱咐，我也只用我自己的那点儿工资和积蓄。可有这么一笔财产垫底，让人心里踏实。那根金条倒是可以用的。阿嫂已经用那条子装饰了自己，她也怂恿我去打几样首饰戴戴，说男人戴首饰也蛮有风度，我说我一个码头杂务工要这种风度作啥？阿嫂撇嘴说：“洋盘！”